

每个时代都需要“辞源人”

言者有意

■雪梅

100 年前，张元济等前辈先贤怀揣文化救国之梦，发出了“国无辞书，无文化之可言”的呼唤，于 1908 年启动了《辞源》编纂工作，并于 1915 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。

100 年后，2015 年 12 月 24 日，历经 8 年编纂，《辞源》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。这不仅是从 400 万字至 1200 万字的超越，更是一种文化、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。

这是一种胸怀家国的文化自觉。张元济，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，颇有远见地创立字典部，毅然投入“商务”1/4 的资本编纂《辞源》，并亲自参与编写，只因为他深知在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面前，中国人不能只有一本康熙字典，需要“开启民智，昌明教育”方能迎来光明时代。陆尔奎，第一版《辞源》的主编，2000 多个日夜，罗书十余万卷，积累成疾，以致失明。而 400 万字的《辞源》，融旧学新知于一炉，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剧烈的文化碰撞、复杂的制度变革和彻底的社会转型中，得以传承复兴、发扬光大。1931 年时，该辞书就已行销数十万册，成为当时全国小学教师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的常备案头辞书。

这也是一种守正开拓的创新精神。传统文化要焕发新的生命，需要找到新方法。《辞源》在编纂方法、编写体例方面创造了全新格局，对后世的辞书编纂与文化创新具有重大示范作用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。尽管如此，“商务”出版人一直明白，辞书完成之际便是新的修订开始之时。只有不断顺应社会发展，那些永不褪色的价值才能葆有勃勃的生机。于是，我们有了第二

版、第三版的《辞源》，相信今后也会有第四次修订，它将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文化工程。

这更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。1976 年学贯中西的黄秋耘先生参加第二次修订时，笑称自己是“遁入空门”，从此青灯常伴闭门穷经。而《辞源》第二版主编吴泽炎先生坚持每天做 60 张卡片，最后竟积有 30 余万张卡片，书未修完，惜人已半身不遂。第三版修订中，3 位主编、22 位分主编、127 位学者，硬是用了 1800 个日夜完成上亿字的校对工作，书证和释义的改动量达 4 万条，改动率达 40%。

人们常说，辞书修订是一个弹性较大的工作，可多可少，可深可浅，要完成具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，弥补旧版系统上的缺失，殊为不易，这也是众多文化工程难以善终的原因。相比过去，现在编写似乎容易了，有海量的数据库电子书可以提供线索，但恰恰是这些浩瀚的资料，更需去伪存真、正本清源的基础铺垫。如果没有一种精神，哪里可以完成一个字一个音的准确校检？

8 年的时间，足以写一部好的专著，留下几篇好的论文，可这么多学者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，他们中，最长者已有 82 岁，最年轻的 35 岁，每个人都竭尽心力，焚膏继晷，守护心底的追求。

第一部《英语词典》的编者塞缪尔·约翰逊在其书大功告成时说，你想要惩罚谁吗？就让他去编字典。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也曾这样形容编撰词典之苦：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，也不应判强制劳动，而应判去编词典，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的折磨和痛苦。这言语中带着自谑，却让行外人能更好理解编纂辞典之艰辛。

吴泽炎曾说：“《辞源》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”，而辞源人的文化，也在一辈一辈的接力中传承下来。这精神，倘若能借由“辞源”之源发散出去，渗透进每个领域，那将带来怎样的文化气象，又将筑就怎样的中国之魂！

画中有话

“老大”坐牢



■小强/文 春鸣/图

媒体在广东省阳江监狱走访发现，一些职务犯被收押后，虽然身份变了，但“高人一等”的优越感依然存在。一些服刑人员，入狱前曾经是上下级关系，到监狱后，“领导”还在指使“下属”干这干那，如要求交换床位等。

坐了牢还想摆官老爷的架子作威作福？不少网友见落马贪官在牢里思

想改造的进展如此不理想，怒了！其实，曾经的领导和下属一起搞职务犯罪，上下级关系早已变成江湖上大哥和小弟的关系。进了牢房，行政职务固然被褫夺了，若大哥和小弟的情谊还在，大哥指使小弟干这干那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

正所谓，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要让某些落马“领导”真正革除“老大”心态，还挺不容易的。

话语与“化雨”

■凌之

一位领导同志在向基层干部群众解释“智库”这一专业性较强的概念时，将其比喻为“黎明前报晓的公鸡”。这通俗易懂地表达了智库的职能和作用，就是及时、准确地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建议，当好参谋，当好预言者，不放“马后炮”。这样的话语生动传神，令人印象深刻，因而能让听者入耳入心。由此想到话语与“化雨”的关系。

能说话、会说话、善对话，是当好领导干部的一门基本功。领导干部的话说得好不好、到不到位，最终要看其能否产生春风化雨的效果，为听众所领悟、所接受，产生思想上的“共鸣”、行动上的“共振”。

话语与“化雨”发音相同、意义有别，甚至表面上看，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。但论及话语的功效，又常常使人联想到“化雨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话语是“化雨”的前提，“化雨”是话语的目的。然而，并非所有话语都能产生“化雨”的效果或影响。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话、不着边际的大话、无关痛痒的空话，不仅不会有“化雨”的功效，反而会让群众心生反感和不满。只有那些鲜活生动、接地气的话语，才会产生“化雨”的效果。领导干部只有如此说话，才能更好地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，才能彰显能力和水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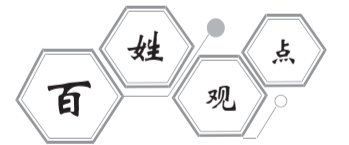
当前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正在全国各地展开。如果领导干部在宣讲时只

会简单地念文件、读报纸，而不善于结合当地实际、联系听众思想进行深入浅出的阐发，宣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把中央精神学懂弄通，并用接地气的话语将其传递给人民群众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产生春风化雨的效果，将中央精神“化”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动。

接地气的的话语源于实践、来自群众，为人民群众所喜爱。应当注意的是，接地气不是粗俗、庸俗和肤浅，而是切合实际、抓住要领，深入浅出、形象生动，言简意赅、通俗易懂，让人民群众听了觉得解渴管用。领导干部使用接地气的的话语，则字字都会有分量、句句都会贴心扉，就会具有“化雨”效果，就会为老百姓所理解、领会和接受。

领导干部来自群众，又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，有基础、有条件掌握接地气的的话语，关键在于愿不愿改进工作作风、是不是接上了地气。如果只想当官“做老爷”，眼睛向上不向下，不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，不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，就只会说群众听不懂的官话、套话。反之，如果经常深入基层，多与群众说心里话、家常话，就会对群众语言及他们爱听、听得懂的话信手拈来、随口道来，使群众语言成为自己的惯用语和工作语言。这说明，要使自己的话语接地气，首先自己要在行动上接地气。所谓知行合一、言行一致，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。

黑名单的意义



■欧仁

据报道，今后，游客在首都机场发生不文明行为影响机场安全，将会被首都机场安保部门和旅游部门同时记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，并可能直接影响出行。日前，北京市旅游委与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正式签署“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合作备忘录”。

近年来，部分发生在机场或飞机上的不文明现象经曝光后，往往引发社会舆论哗然。对于当事人的种种“脑残”举动，大家既不理解，也感到好笑。如何处理这些人也一直是相关部门纠结的事情。成年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简单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显然不足以达到惩戒目的，但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却也还够不上行政拘留的

标准。今后，游客不文明记录将被旅游部门和机场安保部门同时记录在案，这些有“前科”的人今后在乘机或旅游时难免会受到影响。此外，他们在住宿、银行贷款、工商登记等方面也可能会有不便。笔者相信，一旦运行成熟，这一“黑名单”制度还是会起到很大作用的。

建立“黑名单”值得提倡，但是如何让其真正发挥效果还需斟酌。首先，将旅客信息记入“黑名单”的标准是什么？很多航班纠纷固然有旅客不文明的一面，但是机场或航空公司也难辞其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只将板子打在旅客身上显然并不公平。说到底，这还需要监管部门的介入，明确规则的同时也让旅客有申诉的渠道。其次，“黑名单”给当事人带来的影响应该限制在哪些范围，像银行贷款、工商登记这些行为是否应该“株连”，这也需要相关部门及时出面进行权威解释，否则难免会造成权力的滥用。

“黑名单”固然有用，但却不是万能妙药，一个公平有序、讲法讲理的社会环境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。